

华北府县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戴建兵 主编

河北府县乡土碑刻辑录

戴建兵
孙文阁 辑注



天津出版
天津古籍出版社



华北府县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戴建兵 主编

河北府县乡土碑刻辑录

戴建兵 孙文阁 辑注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北府县乡土碑刻辑录 / 戴建兵, 孙文阁辑注. —
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6.5
(华北府县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 戴建兵主编)
ISBN 978-7-5528-0400-3

I. ①河… II. ①戴… ②孙… III. ①碑刻—汇编—
河北省 IV. ①K87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6385号

河北府县乡土碑刻辑录

戴建兵, 孙文阁/辑注

出版人/张玮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唐山新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75 字数 241 千字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8-0400-3 定价: 39.00元

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重大课题
“明清华北地区府县历史文化研究与专题数据库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华北府县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任

戴建兵

编 委

徐建平 武吉庆 赵书良 朱 爱 谷更有

杨 瑞 秦进才 王俊才 陈 丽 赵生泉

申玉山 张少鹏 许 可 李红梅 习永凯

赵志伟 唐丽萍 郭晓丽 孙文阁 线 琦

序 言

以往的历史研究往往陷于三个逻辑体系之中，一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宏大述事，二是皇帝英雄才子佳人式的传统史学模式，三是目前史学研究的个人兴趣及碎片化。我们尝试在中观史学理论的视域下，开展以府县为基本叙事单元的历史文化研究，深入挖掘和系统阐释府县历史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并充分利用日新月异的数字与信息技术手段，积极探索文化脉动及遗产保护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易而言之，试图以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为指导，从府县这一中间层次切入整体历史，以“小地方大历史、小人物大事件”为研究路径，以当代数字与信息技术为研究手段，以基层民众生活和文化事项为研究内容，努力挖掘府县层面丰富而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从府县看朝廷、政府，从府县看乡里百姓，通过系列的创新性研究成果，深刻揭示绵延不绝的中华文化的内在规律，阐明中华民族精神的渊源与特质，从而重新建构和解释宏观层面上的历史文化。

府县级政权是历史上变动最小的基层政权，它与下层百姓的联系甚为紧密。其政令运作、官民互动、社会结构、文教状况、宗教信仰、民风民俗以及境内的音乐、美术和古代建筑等，无一不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息息相关。所以，府县承载了中华历史文化的具体事项，保留了基层民众的生活场景，积淀了各具特色的大众智慧，传承了因地制宜的民风与民俗，能够具体而生动地

呈现郡县制确立以来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

府县历史文化包含政治运行、经济活动、社会生活、文学艺术、价值观念和民俗信仰等诸多方面的丰富内涵,作为中观层面的文化形态,在中国文化的链条中承上启下,无以替代。通过研究视角和研究手段的创新,深入而系统地开展府县层面的历史文化研究,或可对当今的研究范式、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示范和启示意义。

一、以府县为叙事单元的中观史学理论考量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史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存有游移于宏观的宏大叙事和微观的细碎琐碎之间的偏颇。前者机械地呼应和诠释意识形态,选题流于空泛,论证失之疏阔,往往以玄想空谈代替切实印证;后者虽有视角向下和关注民间社会的正确指向,但因其较少有整体与全局之观照,每每纠缠于细枝末节,乃至同样疏离于历史的真相和常态。我们认为,新的史学观念和史学理论的引入,或可有助于这种偏弊的矫治。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提出了“中层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概念。历史学者杨念群在把这一理论引入历史研究方面进行了筚路蓝缕的探索。他认为,“通过庙宇、宗族、一个具体的村庄来解剖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变迁,这是很重要的转折,也为中层理论进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概括地讲,一是对叙事的空间化过程,二是对某个传统空间的挖掘,这是我采用空间理论的着落点”^①。其《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和《儒学地域化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的互动研究》等,就是这种可贵探索的见证。受其启发,我们尝试开展中观史学理论视域下的府县历史文化研究,这种尝试主要

^① 杨念群:《当代中国历史学何以引入中层理论》,《社会观察》2004年第7期。

出于如下几个方面的考量。

(一)从方法论的视角而言,是试图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寻找一个中间层面的切入点。视角向上的国家层面的历史文化研究,在理论上经常陷于机械诠释和简单对应意识形态之窠臼,在对象上过于关注重大事项而抽掉了一些不该忽略的具体问题,在操作上因问题过于宏大而难免顾此失彼。而视角向下的社会层面的历史文化研究,又往往缺乏对历史文化的整体把握和宏观统筹,每每忽略具体问题之间及具体问题与重大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选取府县这样一个适中层面进行历史文化研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

(二)从社会运行机制的视角而言,是把致思之聚焦于中间行政机构和行政力量作用于文化活动的具体方式。府县是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间行政机构和行政力量,它在国家主流文化和主导价值的生成及其作用方式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整合与引导作用。通过考察府县行政力量对民间文化的干预和作用方式,可以深入了解主流文化在民间发生作用的机制,从而更为准确地把握中华文化的特质及其发展变化规律。

(三)从文化纵向构成和互动路径而言,是把府县文化视为国家主流文化、社会民间文化和边缘支系文化的中间环节和调适力量。在文化构成的纵向链条上,府县层级的文化上承国家主流文化,下启下层大众文化,在上下两个层级的文化之间起着融通和调适作用。所以,通过府县文化研究来认识和把握中华整体文化,是一条值得探索的研究路径。

(四)从地域文化覆盖的特定空间范围而言,是把不同府县辖区内的文化,视为相对独立的、中等规模的、更易操作的研究样本。以往的区域文化研究,一般沿用传统的区域文化概念,如燕赵

文化、齐鲁文化、湖湘文化和岭南文化等,以这一层级规模的空间范围来界定具有一定共同特征的区域文化,并将其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样本,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它也存在着可以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一是这些较为广袤的区域内部的文化差异难以呈现;二是在对这些区域文化进行具体的研究时,尚需从具有典型意义的较小区域文化单元切入。因此,开展府县层级规模的文化研究,有望找到一系列更能充分呈现文化特征和意义的空间范围和叙事单元,使今后的区域文化研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从而更易于趋向深化,并取得更为实质性的进展。

二、府县视角下国家治理透视

所谓中观史观视角下的明清国家治理研究,概而言之就是试图在府县层级的低层视角下,具象观察当时中央和地方互动层面的行政运作实态,从而呈现和构架更为立体、更为活化、更为真实,乃至全息综合的历史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此番教育实践活动中谈到,“县一级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居于重要地位。郡县治,天下安。我国自秦汉确立郡县制后,无论行政区划怎么调整,县一级都是最稳定的,历朝历代都高度重视县级官员选拔任用。清代,县令由吏部直接任命,是古代的‘中管干部’,而且赴任前必须到朝廷报到,皇帝亲自看,如发现有不合适或出格之人立即更换”。应该说,这一观察是建立在深入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演进实际的基础之上的:

一是深刻理解历史上的国家治理。国家治理是指一个政权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事务所实施的实际管理。国家治理所构架的治理体系,首先包括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或曰制度执行力,正是通过这个体系体现出来的。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一般而言,中国前近代时期国家治理的实现,主要依赖于君权神授、精神控制、官僚体系、宗法体系、乡约礼俗等。而从中观史观的视角观之,府县历史文化研究则恰恰是具体而深入地把握和理解当时国家治理链条的重要环节。

二是理清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重构当时的国家治理观念、设置和运作过程。在中观史观和区域研究视域下,明清时期的府县既是国家治理的对象,也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有机构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这一体系的纵向结构看,中央通过地方官员的任命、稽核以及舆情监测、事件显露等一系列的手段,实现对府县层级地方政权的有效掌控;而从横向的府县层级的治理实态看,各地基层政权通过司法、教谕、乡贤、礼俗等国家意志或社会文化的有形与无形设施,实施对社会基层“软硬兼施”的治理。在国家治理的垂直链条中,府县无疑承载着无可替代的承上启下功能,既上承政令,又下驭黎庶。其思维与运作方式,既不可能完全上同于中央政权,又不可能完全下化于民间社会。以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儒学为例,它在本质上应该属于适应农业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理论观念或官方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功能或许有类于宗教,而它所塑造的“朝廷的选民”,在通过科场进入官场之后,以合于其学说理论的社会行为治理某一行政区域。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在很大程度上应该缘此而言。从思想层面看,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基于正统儒学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期许,才使因应于此的对个人、家庭和国家等不同主体的制度强制和道德约束逐步完善。对于升斗小民而言,如果这种思想构架显得过于阳春白雪或曲高和寡,那么府县为因应

于此而普遍设立的城隍土地，则无疑显得更为平易或更接地气。从行政运作层面看，诸如皇帝春日躬耕之类的象征性行为，以及各县沿袭的所谓打“土牛”、促春耕等民俗，若能加以系统研究，亦能体味出个中深意。

三是试图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维系之间寻找中间层面的切入点。传统的视角向上的国家层面的历史研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时难免陷于机械诠释和简单对应意识形态之窠臼。由于过分关注重大事项的演进，又有意无意地抽掉了中间层次的节点。而视角向下的社会史语境下的历史文化研究，又往往缺乏对历史文化的整体把握和宏观统筹，每每忽略具体问题之间及具体问题与重大问题之间最为关键的中间节点及其对应于此的内在关联。而中观史观下的府县视角，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

四是通过研究对应于国家治理的社会运行机制，探索中层行政机构作用于文化、社会活动的具体方式。府县是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间行政机构和行政力量，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而言，其在国家主流文化和主导价值的生成及其作用方式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整合与引导作用。通过考察府县行政力量对民间文化的干预和作用方式，可以深入了解主流文化在民间发生作用的机制，从而更为准确地把握中华文化的特质及其发展变化规律。

五是探索不同层级社会历史文化的纵向构成和互动路径。府县文化介于中华文化纵向结构的中间层次，对国家主流文化、社会民间文化和边缘支系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调适作用。府县文化本身及其运行机制，就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在文化构成的纵向链条上，府县层级的文化上承国家主流文化，下启下层大众文化，发挥着上下融通、居间调适的重要作用。

六是从经济运行的视角而言,在中国前近代经济进程以及近代经济转轨,乃至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县域经济都在宏观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前近代社会,小区域经济是最能反映其社会形态经济属性的研究领域。然而,关于近代经济转轨历程中的区域差别及其对整个社会的多元影响,始终未能引起学人的足够关注。毋庸置疑,小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对社会生活和环境变迁的影响是复杂而多面的,而在中观史观的视域内,这种影响可以更为充分地显现出来。由此可见,明清府县经济相对良性的运行,正是前近代国家经济稳定和社会有序的物质基础,彰显了前近代经济所独有的国家经济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

七是通过对比知府和县官历史的深入考察,勾勒出较为完整的中央与地方治理的历史轨迹。习近平总书记曾言:“历史上许多名人志士为官从政也是从县一级起步的。我一直讲‘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他还引经据典并列举实例指出,举凡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清代画家和文学家郑板桥,以及陶渊明、狄仁杰、包拯、海瑞等诸多历史名人,都曾充任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知县。

综上所述,中观史观视角下基于府县层级的明清国家治理研究,或可在历史研究理论、方法、范式的探索,历史研究的广度拓展和深度掘进,以及传统文化传承和现代文化建设等方面,展现出一派令人心仪的利好前景。

三、府县历史文化研究的愿景

以中观层级规模的府县行政区域作为叙事单元来开展历史文化研究,可以充分借鉴区域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领域的理论、方法和经验,既符合史学理论、方法演进的内在逻辑,又可以为历史文化的实证研究提供一系列的具体研究样本,其可预期的学术

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不同学科专业学术群体间的深度合作

杨念群在论及其提出中层理论的初衷时说：“我在史学界提出中层理论，就是为了呼唤在国内应不断出现一些这样的概念，这些概念是对某种集团性或者地区性事物的描述。而且这种可操作性概念具有一种‘一般性’。在不同的现象、维度里面，其解释的范围既可能是经济史现象，也可能是社会史现象，或者是文化史现象。它可能是一个地区的，一个社团的，也可能是一个人群的。总之是某种集束类型的现象。”^①所谓“对某种集团性或者地区性事物的描述”，所谓解释一定空间范围内的“集束类型的现象”，如果在学科交叉融合的平台上来实现，无疑会大大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解决分科治学背景下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取得事半功倍的功效。中观历史理论视域下的府县历史文化研究，在府县这样一个空间范围内，把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广泛涉及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政治学、建筑学、数学、计算机、艺术、宗教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所以，具有不同学科专业知识背景的研究人员的协同攻关，是顺利开展课题研究的必要条件。这种探索，可以激发不同学科专业学术群体间深度合作的自觉，一定程度上消除分科治学所造成的弊端，有可能将历史文化的特质和演进规律更为准确地呈现出来。

（二）带动新材料和新问题的发现

陈寅恪先生曾如此论述学术趋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

① 杨念群：《中层理论与新社会史观的兴起》，《开放时代》2002年第2期。

徒,所能同喻者也。”^①我们虽不敢妄言该项探索即可收到“预流”之效,但我们期望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发现一些新材料和新问题。由于学界对府县层面的历史文化研究的学术与社会价值未予足够的重视,致使很多相关资料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无用或辅助材料,从而未被纳入搜集、整理和使用的范围。在进行中观史学理论视域下的府县历史文化研究过程中,随着研究视角的转换,以往那些视而不见或鲜为人知的历史文化资料将会日益引起研究人员的高度关注和全新阐释。与之相应,一些历史文化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就可以被建立起来,传统视域和方法之下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而随着新材料的使用,新的问题意识就可能不断涌现,新的研究领域就可能被相继开拓。

(三) 益于比较研究法的充分使用

历史比较研究法是历史文化研究过程中常用且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晚近以来,它得到了愈益广泛的运用。中观史学视域下的府县历史文化研究,可以为历史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从时间角度看,历时与共时之间可以进行比较;从空间角度而言,不同府县之间可以进行比较。而府县这一层级规模的设定,可以为历史文化现象的比较研究提供一系列理想的比较对象。将不同区域内的不同府县的历史文化事项进行比较研究,必将有益于准确阐释一定区域内历史文化的本质特征。

(四) 直接助力地方社会文化、经济发展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在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而真正的社会进步既要有经济发展的支持,更需要社会文化的全面进步。中观视角下的府县文化研究对于目前社

^①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会对于文化发展的需求恰是对症良药。首先中观的视角摆脱了过去文化研究大而空、无抓手、远离实际的弊端。其次,中观层面的府县文化其数量本身就是文化创新的基础。第三,府县文化研究对于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可有直接的助力,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地方文化旅游资源的深度挖掘,当地文化产品的设计与开发等等。

总之,中观史学理论视域下的府县历史文化研究,或可在一定程度上矫治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存在的偏失,为充满变革张力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开辟出新的学术境界。

为此河北师范大学成立了县域历史文化中心,进行学术研究。

戴建兵 武吉庆

前 言

金石碑刻为古人治学一脉,在国内外碑铭学更有崇高的地位。中国古代的金石学是考古学的前身,它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欧阳修是金石学的开创者。“金石”一词最早出现于学者曾巩的《金石录》中。清代王鸣盛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学这一名称。在关于金石学的著作中,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铭刻资料,甚至有的书籍还辑录了一些器物的图像以及其名称和用途,这些使得金石学的著作具有了一定的史料价值。

清代以后的金石学受清代乾嘉学派影响,而进入鼎盛时期。乾隆年间曾据清宫所藏古物,御纂《西清古鉴》等书,推动了金石研究的复兴,其后有《考工创物小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据古录金文》《斋集古录》《缀遗斋彝器款识考识》《寰宇访碑录》《金石萃编》《古泉汇》及《金石索》等书问世,这些史料均为有成就的金石学著作。这一时期研究范围也逐步扩大,对铜镜、兵符、砖瓦及封泥等开始有专门研究,鉴别和考释水平也显著提高。清末民初,新发现的甲骨和简牍也被纳入金石学的研究范围,并扩及明器和各种杂器。罗振玉和王国维是此时集大成的学者。朱剑心的《金石学》、马衡著《中国金石学概要》都对金石学作了较全面的总结。

碑刻为金石学又一支。当代学者黄永年先生谓“金石”之“金”已别有归宿,惟“石”尚无附丽。近数十年来,则唯有书法爱好者尚搜求拓本、拓片,考史事已多取材著录碑刻文字之书籍,大学历史系所讲考古学则以西方(甚少)碑刻文字,于华夏碑刻亦多仍而不讲。但是,20世纪80年代,台湾的学术界较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地方志中相关金石书目,特别是相关碑石资料即金石志进行了重新组合重印,构架了巨著《石刻资料新编》。台湾重刻书目为台湾新文

丰出版公司出版的林荣华校编《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30册,102种,精装16开,共23038页;第二辑,20册,242种,精装16开,共15005页;第三辑,40册,700多种,精装16开,共28000页。大陆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地方上一些从事考古的学者对于当地的碑刻也进行了重新整理,出版了一些相关著作:

《保定名碑》,侯璐主编,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该书对保定古代碑刻的分布及种类进行了介绍,而且对21块碑石进行了重点的分析和介绍。

《邯郸碑刻》,吴光田、李强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该书对汉代到现代的58块碑石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保定出土墓志选注》,侯璐主编,河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出版。该书收录了北朝和隋唐时期的21块墓石,并且进行了注解。

《古莲池碑刻萃集》,孙待林主编,花山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该书对莲池的10余种名碑及莲池书院法帖进行了重新印制。

《古莲池碑刻选解》,郭铮、孙待林、张媛著,方志出版社1997年出版。

《河北金石辑录》,石永士、王素芳、裴淑兰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书中分序、凡例、河北金石综述、河北金石要目录、河北金石目录简目、河北金石要、河北金石目录及附录后记等。

《河北柏乡金石录》,史云征、史磊主编,文物出版社2006年出版。该书收入四元碑、一明碑及柏乡碑刻目录。

《洺州记事》,刘金鹏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该书辑录了古威县的碑刻。

《石家庄文物大观》一书有大量石家庄地区碑石相关的记载。

《涿州贞石录》,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出版。该书主要收录的是有关涿州的石刻、碑铭等。

《涿州碑铭墓志》,杨少山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

《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部分),文物出版社2004年出版。本书为《新中国出土墓志》的第一卷。该卷收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出土墓志450合(方),其中东汉1方,魏晋35方,隋唐133方,宋代以后271方,多数为首次发表。全书分图版、释文两册,另附墓志检索表及人名、地名索引。

《河北满族蒙古族碑刻选编》,尹利民编“河北少数民族古籍丛书”,作家出